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Marburg School in Ortega's Philosophy on Human Life

^{1,2}LIN Yao

¹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ina

²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July 9, 2026

Accepted: August 12,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LIN Yao. (2026). The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Marburg School in Ortega's Philosophy on Human Lif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3), 234–243, DOI: 10. 53789/j. 1653–0465. 2026. 0603. 0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24>

Abstract: Ortega y Gasset was an important Spanish philosopher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thought of human life runs through his entire philosophical system and becomes the core of hi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in various periods. Existing research mostly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phenomenology on this thought, lacking a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role of the Marburg School in its form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adopts the textual research method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Cohen's systematic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relations, as well as Natorp's social pedagogy, on Ortega's thought of human life. In 1911, Ortega began to engage with Husserl's phenomenology. He gradually realize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Marburg School's overemphasis on logical rationality and knowledge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absorption and assimilation, he launched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of it, achieving a shift from knowledge construction to the intentionality of consciousness, and from logical rationality to concrete human life. At the cultural level, he fused German rationalism with Mediterranean sensualism.

Keywords: José Ortega y Gasset; Human Life; Marburg School; phenomenology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LIN Yao is a doctoral candidate at the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nd a lecturer at the Center for Latin American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 main research focus is Western philosophy. Her email address is linyao@swust.edu.cn.

奧爾特加人類生活思想對馬堡學派的繼承與超越

林 瑤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西南科技大學

摘 要：奧爾特加是 20 世紀西班牙重要的哲學家，人類生活思想貫穿其整個哲學體系，並成為其各個時期哲學反思的核心。現有研究多關注現象學對這一思想的影響，對馬堡學派在其形成過程中的作用缺乏系統闡釋。本文採用文本研究法，考察柯亨的系統哲學與關係理念、納托普的社會教育學對奧爾特加人類生活思想的影響。1911 年，奧爾特加開始接觸胡塞爾現象學，他逐漸意識到馬堡學派過度強調邏輯理性與知識建構的局限性，在吸收與同化的基礎上對其展開批判與超越，實現了由知識建構轉向意識意向性，由邏輯理性轉向具體生活，並在文化層面將日耳曼理性主義與地中海感覺主義融合。

關鍵詞：奧爾特加；人類生活；馬堡學派；現象學

基金項目：該論文受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外國語言文學研究中心『奧爾特加文學作品視域下「人類生活」哲學思想研究』（SCWY-02）支持。

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1883-1955)是 20 世紀西班牙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和作家，人類生活(vida humana)始終構成其哲學思想的核心，並貫穿其一生。他曾表示：『自 1914 年他出版《堂吉訶德沉思錄》以來，他所有的哲學思考都深深植根於對人類生活現象的探索與理解之中』。^①然而，人類生活思想並非始於《堂吉訶德沉思錄》，其形成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思想孕育過程。1906 年和 1911 年，奧爾特加兩度赴德國馬堡大學求學，先後師從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代表人物柯亨(Hermann Cohen)和納托普(Paul Natorp)，系統接受了馬堡學派關於系統哲學、認識論和社會教育學的訓練。這段求學經歷不僅奠定了其早期哲學的理論基礎，也深刻影響了其理解人與世界關係的基本方式，為後來人類生活思想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關於奧爾特加與馬堡學派之間的關係，國外學界已經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奧林格(Orringer)較早從德國思想來源的角度系統考察了奧爾特加與馬堡學派的關係^②，圍繞柯亨、納托普對其早期哲學特別是美學思想的影響展開分析，奠定了這一議題的研究基礎^③。莫拉(Mora)^④、莫隆(Morón)^⑤和塞雷索(Cerezo)^⑥等思想史研究者，依據不同的標準對奧爾特加思想進行階段劃分，均將新康德主義時期視為其哲學發展的起點，強調生命理性和歷史理性是在批判繼承馬堡學派基礎上逐步形成的。近年來，萊什奇娜(Leszczyna)^⑦結合奧爾特加基金會整理出版的書信、講義等文獻，進一步梳理了奧爾特加在馬堡時期的學習經歷及其與柯亨、納托普、哈特曼等人的思想交往，進一步深化了對奧爾特加與馬堡學派關係的認識。相比之下，國內學界主要集中於生命理性、歷史理性以及現象學等主題，對奧爾特加與馬堡學派關係的討論多限於思想淵源介紹，缺乏以人類生活思想為中心，系統考察其對馬堡學派的繼承、批判與超越的研究。

基於此，本文從人類生活思想的生成過程出發，重新審視奧爾特加與馬堡學派之間的思想關聯，分析其如何在繼承馬堡學派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吸收胡塞爾現象學的理論成果，不斷修正和突破新康德主義的理論框架，最終形成以人類生活為核心的哲學思想。通過這一考察，進一步揭示其人類生活思想的生成脈絡，為理解奧爾特加哲學的發展及其思想淵源提供新的研究視角。



一、奧爾特加與馬堡學派的思想關聯

奧爾特加與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的思想接觸並非偶然，而是與當時的歷史文化背景密切相關。一方面，20 世紀初的西班牙正陷入社會與文化危機之中，奧爾特加希望借助德國的科學與文化來拯救西班牙；另一方面，德國哲學界新康德主義思潮蓬勃興起，尤其是馬堡學派強調『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的理性建構，為年輕的奧爾特加提供了學術典範和思想方向。然而，隨著思想的深化，奧爾特加也逐漸意識到新康德主義方法論的局限性。它過於強調理性的先驗形式與概念建構，忽視了現實世界中的經驗與具體現實。與此同時，胡塞爾現象學『回到事物本身』的興起，強調經驗的原初性和生活世界的優先性，這不僅為奧爾特加開闢了新的哲學視野，也推動了他的思想從新康德主義到胡塞爾現象學的轉向。

（一）西班牙的社會與文化危機

西班牙是歐洲一個古老的國家，擁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遺產。1492 年，在西班牙女王伊薩貝爾一世的鼎力支持下，哥倫布發現了西印度群島，自此，西班牙踏上了征服美洲新大陸的冒險之旅。憑藉不斷的殖民擴張，西班牙的殖民勢力遍佈世界各地，在 16 世紀西班牙被稱為『日不落帝國』。但是，自 1588 年西班牙無敵艦隊被英國擊敗後，其國勢便每況愈下。進入 19 世紀，西班牙在列強入侵與殖民地獨立的雙重打擊下日益衰弱，1898 年美西戰爭的失敗更成為帝國崩潰的標誌，西班牙徹底喪失了古巴、菲律賓和關島等海外殖民地。

美西戰爭後，西班牙經濟形勢慘澹，呈預算赤字、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1899—1900 年的西班牙財政大幅削減了戰爭和海軍預算，減少了貨幣發行量，增加稅收。^⑧這種破壞性的經濟形勢，同時也加劇了社會危機。20 世紀初，西班牙絕大多數人生活在農村，文盲率高達 50%，教育極度落後。^⑨此外，在思想與文化上，天主教壟斷高等教育，只有少數學術機構如 1876 年創辦的自由教育學院 (Institución Libre de Enseñanza) 敢於突破宗教的桎梏。

隨著西班牙國勢的急劇衰落、經濟的崩潰以及文化的日漸落後，西班牙已然無法與文化強國，尤其是德國相提並論。面對國家的危機，西班牙的知識份子群體，特別是文學和哲學領域的知識份子，開始積極探索救國道路。其中，『98 年一代』和『14 年一代』是兩個尤為突出的文化救國流派。『98 年一代』代表人物烏納穆諾主張『西班牙非洲化』，強調西班牙民族性和傳統文化的復興；而作為『14 年一代』的代表人物奧爾特加主張『西班牙歐洲化』，明確提出『西班牙是問題，歐洲是解決方案』，^⑩認為只有通過引入德國的科學與文化，才能帶領西班牙走出困境，實現社會的全面復興。

（二）新康德主義的興起與馬堡學派的哲學旨趣

新康德主義是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在德國興起的一場重要哲學思潮。它誕生於古典唯心主義衰落與科學領域唯物主義思潮盛行的背景下，其根本訴求是『回到康德』。新康德主義者試圖通過對康德哲學的重釋與發展，構建新的理論體系，從而回應當時哲學與科學發展的雙重危機。作為一個多中心的思想潮流，新康德主義主要分為三個方向：朗格的生理學派、柯亨與納托普的馬堡學派以及李凱爾特和溫德爾班等人領導的西南學派。

馬堡學派在新康德主義內部影響尤為深遠。以柯亨為代表的學者將哲學的重心放在自然科學的方法論與邏輯結構上，強調通過先驗邏輯來奠定科學與哲學統一的基礎。他主張：『把科學的先驗性看做是純粹思想的邏輯，先驗邏輯是一切科學文化事實中提煉出的純粹規律，並可以被經驗事實驗證』。^⑪由此，科學知

識的邏輯結構具有客觀性和統一性,超越了個體的心理過程,是學科系統化的根基。此外,他強調認識活動必須建立在思維的基礎上,提出:『思維不能產生於本身之外的某個地方,純粹思維應當從其本身中產生可以認識的東西』。^⑪而這裏所指的『可以認識的東西』並不是預先給定的實在,而是思維所生成的對象。由此可見,人思維的過程同時又是創造其對象、創造自然界,即存在的過程。思維居於第一性,而存在則處於第二性,思維決定存在。這一立場意味著,柯亨將思維視作獨立而具有創造力的實在。在試圖克服主觀唯心主義局限性的同時,他實際上走向了一種客觀唯心論的立場。

(三) 奧爾特加的馬堡求學與哲學轉向

為尋求救國之道,奧爾特加在 20 世紀初曾三次赴德國留學,現代德國哲學對他思想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先後在萊比錫、柏林以及馬堡等地求學,特別是在馬堡的學習,使其直接接觸新康德主義思潮。1906 年和 1911 年,他兩次赴馬堡大學學習,師從新康德主義學派的主要宣導者柯亨和納托普。在他們的指導下研究康德,並分別學習了『批判唯心主義』和『社會教育學』。馬堡大學研究自然科學的邏輯基礎,強調哲學應當建立在嚴密的邏輯結構與科學基礎之上,主張從康德批判哲學出發,將哲學作為研究科學知識可能性的邏輯基礎學科,為奧爾特加提供了他長期尋求的哲學基礎。馬堡學派不僅深刻影響了他的學術訓練與哲學素養,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了他的思想氣質與人格特質。

在新康德主義學派的影響下,1911 年以前的奧爾特加哲學思想表現出『反個人主義、反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的特徵』^⑫,在其早期作品中,他強調通過邏輯和數學範疇對現實進行客觀分析,以實現更嚴謹的認知體系,其思想明顯具有新康德主義式的理想主義傾向。正如他坦言自己『至少一半的希望和幾乎全部的學術訓練來自於馬堡求學時期』^⑬,他承認馬堡大學的經歷是其哲學成長的重要基石,新康德主義對其哲學修養的提升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然而,他也批評道,馬堡的學術氛圍幾乎只聚焦於康德以及那些被改造為康德主義的哲學家,如柏拉圖、笛卡爾和萊布尼茨。他將自己與康德和新康德哲學的鬥爭比喻為在『康德式監獄』中進行。^⑭

在 1911 年,奧爾特加再次赴馬堡學習。他參加了柯亨弟子哈特曼的哲學小組,開始接觸剛剛登上歷史舞臺的布倫塔諾和胡塞爾現象學。胡塞爾『回到事物本身』的口號深深吸引了他,這與他渴望的關注事物本身,非理論先行相契合。他認為現象學在研究深度和嚴謹性上遠遠超過了新康德主義,具有無可比擬的吸引力。此外,他與胡塞爾懷有共同的目標,即超越 18 世紀和 19 世紀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哲學,邁向 20 世紀的新哲學。他們希望在各自的綜合體系中克服這些傳統哲學觀念的局限性,為世界帶來新的哲學思考。他意識到胡塞爾現象學具有新康德主義所欠缺的優點,此後其哲學興趣逐漸從新康德主義轉向胡塞爾現象學。這一轉向標誌著奧爾特加逐步擺脫新康德主義的客觀唯心主義,轉向更為具體的生命哲學與生活世界的真實經驗。新康德主義時期雖然不是奧爾特加思想的終點,卻是其哲學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時期,其思想不僅為他日後的批判與超越提供了啟示,更是他思想發展的基石。

二、馬堡學派對奧爾特加人類生活思想的影響

奧爾特加在馬堡時期深受柯亨與納托普的影響,並在此階段初步提出了人類生活思想。受柯亨系統化哲學的啟發,他致力於構建以人類生活為核心的哲學體系,然而這一設想最終並未完全實現。在早期思考中,奧爾特加將生活理解為意識在與世界其他部分之間建立的一種關係系統,強調萬物的本質不在於孤立存在,而在於彼此的關聯。然而,在這一時期,他仍然從先驗主體出發,將世界視作由主體關係所構成的系統,並認為只有通過觀念才能加以把握。在這一框架下,生活世界被抽象化為一種普遍理念。與此同時,納



托普的社會教育學強化了他對環境的重視，凸顯了教育在生活中實現自我價值與改善環境方面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見，馬堡學派既為奧爾特加提供了邏輯方法與概念資源，也為其人類生活思想的孕育奠定了堅實的學理基礎。

（一）柯亨系統哲學對奧爾特加人類生活的啟發

在實證主義盛行的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哲學一度陷入低谷。實證主義強調只有經過經驗證實的知識才有意義，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哲學的地位，使其被視為不具備科學嚴謹性的學問。在此背景下，柯亨從形式上恢復了哲學作為嚴密科學的思想，他強調哲學的邏輯性和學科性，試圖將哲學與自然科學等其他學科相結合，從而賦予哲學一種更為系統化、結構化的形態。正因如此，柯亨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確立了哲學在學術界的地位，奧爾特加曾評價『德國哲學和全世界的哲學都欠他一筆債……他迫使人們與艱深的哲學親密接觸……恢復了大家對於體系的嚮往』^⑩。

柯亨的哲學思想具有高度的系統性和完整性。針對康德的三大批判，柯亨在其出版的《康德的經驗理論》、《康德對倫理學的論證》和《康德對美學的論證》三部著作中進行了系統的重新解釋和評述。從 20 世紀初起，他致力於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針對以上三個主題，分別以《純粹認識的邏輯》《純粹意志的倫理學》《純粹感受的美學》為支柱，構建了一個以純粹邏輯為立足點、能夠統攝自然科學、倫理學與美學的統一體系。在柯亨看來，哲學應該是一個內在自洽、邏輯嚴密、足以解釋整個人類經驗與知識的整體結構。這種追求使他深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生，其中就包括奧爾特加。

在奧爾特加的哲學體系中，對思想系統的追求成為了一個核心要素並貫穿其整個哲學思考歷程，這無疑是對柯亨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早在 1908 年，他便指出『系統是各種問題的統一』，^⑪因為對於思想者而言，他們的各種觀念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受柯亨系統觀的啟發，奧爾特加在《天堂裏的亞當》中提出瞭解決人類生活問題的三個階段：『自然科學就是解決問題的初級階段；倫理道德是中級階段；藝術則是嘗試著最終解決問題』。^⑫自然科學作為分析人類生活的第一階段，通過抽象化手段揭示事物的共性，將生活簡化為規律的集合；倫理科學作為分析人類生活的第二階段，它將生活視為一個關係領域，關注生活的精神狀態，強調存在的道德維度。這兩者都將現實割裂為物質與精神兩大領域，然而，現實之本質絕非單純歸屬任一領域。於是，第三階段的藝術因此應運而生，以個體化和具體化的方式，展現事物的獨特生命力，它彌合了科學與倫理的分裂，將物質與精神統一於感知與形式之中，成為探尋人類存在意義的路徑。雖然奧爾特加始終致力於人類生活思想體系的構建，但由於其觀念的分散性與碎片化，他最終未能形成一個完整系統的理論框架。

（二）柯亨關係理念對奧爾特加人類生活的塑造

1910 年，奧爾特加首次對生活進行了明確的闡釋，他寫道：『任何事物的生活就是其存在……每件事物的存在即歸結為純粹的相互關係。』^⑬在奧爾特加看來，事物的存在並非源於其內在的、孤立的本質，而是建立於其與周遭萬物的互動關係之中。為了闡釋這一觀點，他援引了行星系統的比喻。在行星系統尚未被構思之前，行星本身尚未存在。行星系統是一個關係系統：每顆行星的存在都是在這套關係中確定，猶如我們在網格中確定一個點一樣。沒有其他行星，地球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系統中的每個元素都需要其他所有元素：這就是其他元素之間的相互關係。由此可見，萬事萬物的本質被理解為純粹的關係。

這一以關係為核心的存在觀，顯然受到了柯亨新康德主義的深刻影響。柯亨曾在《康德對美學的論證》中用物理運動體來舉例，『在力學中，太陽是一個品質點，它需要品質點之間的關係。只有在描繪這些天體運動的曲線中，它們本身才被客觀化』。^⑭因此，對物理學而言，移動的物體是與其他物體間關係的思維計畫



或理念。同時,柯亨進一步指出,事物的本質並不能僅僅依靠其內部屬性來定義,而必須置於其與他物之間的關係網絡中加以理解。他強調:『事物的定義不能僅僅基於其本身的性質或特徵,而應該考慮到它與其他物體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構成了我們對事物的理解和認識的基礎』。^②

奧爾特加正是在這一哲學背景下,逐漸形成了其早期關於生活與存在的理解。他將存在理解為一種純粹的關係,強調它不是在事物自身中預設的,而是在主客交互、意識參與中生成的。這種理解與柯亨強調理性建構與關係理念高度一致。正如有學者指出:奧爾特加將事物的存在視為與其他事物的關係計畫,這是純粹概念性的存在,而其生活或存在概念對應於柯亨關於事物本身的理念』。^③然而,隨著奧爾特加思想的成熟,他逐漸突破了這種偏重理性建構的框架。在胡塞爾現象學的影響下,他對人類生活的理解也發生了轉向,從強調理念化的關係逐步發展為注重主體在具體環境中體驗性的生存維度。

(三) 納托普社會教育學對奧爾特加人類生活的影響

在馬堡期間,奧爾特加不僅學習了柯亨的批判唯心主義,還在納托普的指導下系統學習了柏拉圖和裴斯塔洛齊的教育學。納托普的教育理論以人的社會性和相互依賴性為核心,主張教育不僅是個體發展的內在需求,更是個體融入共同體、實現社會化的過程。在他看來,教育並非單純的知識傳遞,而是個體在與社會持續互動中不斷完善自我的實踐過程。正如納托普所言,教育的根本在於『教育與共同體這一普遍的相互關係』,^④其終極目標在於通過共同體生活塑造人的內在人性,使個體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因此,個人的成長並非孤立完成,而是深深植根於社會交往的網路之中。一方面,個人在社會生活中不斷受到他人影響;另一方面,又通過回應這種影響來塑造自身。納托普甚至明確指出:『如果沒有社會,個人就根本不是人。』^⑤

奧爾特加深受納托普社會教育學的影響,他始終重視教育在社會中所發揮的推動作用。1910年,他在畢爾巴鄂的文化機構『社會中心』(La Sociedad El Sitio)發表題為『作為政治專案的社會教育』(La pedagogía social como programa político)的演講,表達了其對西班牙公眾教育的基本觀點。他將社會教育視為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強調教育在塑造社會、推動社會進步中的關鍵作用,並提出:『西班牙問題已經成為教育學的問題』。^⑥

1914年,奧爾特加提出了著名的論斷『我即是我與我所處的環境,如果我不拯救我的環境,自己也無法得救』。^⑦這句話強調了個人與環境之間的緊密聯繫,以及個人在改善自身處境中的責任和主動性。在奧爾特加的人類生活中,環境是其中的核心要素,具有強制性特徵。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環境,而是被拋入其中。環境憑藉其強制性特點,以積極或消極的方式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使個人的生活變得困難或容易。雖然個人無法選擇其環境,但個人享有在環境中進行自由選擇的權利,並通過改造外在環境來尋求安全感。在這一過程中,教育發揮著重要作用。它為人提供知識、價值與方法,使人能夠主動回應社會挑戰,推動環境的改善與重建。更重要的是,教育通過培養人的主體性與協同精神,使人能夠在共同體中與他人共同成長,並在積極改造環境的實踐中實現自我。由此可見,教育在奧爾特加人類生活思想中,不僅是知識傳授,更是人得以拯救其環境、進而成就自我的重要環節。

三、奧爾特加人類生活對馬堡學派的超越

奧爾特加生活在康德思想的牢獄之中多年,他認為擺脫康德主義的途徑就是:『必須在自己的內心深處,成為康德主義者,然後通過吸收消化,重生為新的精神』。^⑧在1911年,他重返馬堡大學,開始接觸現象學,在思想上逐漸疏遠新康德主義。他發現新康德主義過分強調理性建構而忽視了事物本身,其過度邏輯化與抽象化的哲學使思維脫離了現實生活,因此他提出必須回到具體生活之中。與此同時,他對建構主義



的局限性提出質疑,認為認識並非主體的純粹創造,而是建立在對象先行顯現基礎上的意向關係,這促使他引入現象學的『意向性』來重新奠定哲學的基礎。在文化層面,奧爾特加批判新康德主義所追求的普遍文化理想,通過觀察歐洲的兩種典型文化,即日耳曼的理性文化與地中海的感性文化,主張在二者之間尋求一種批判性的融合,以此為西班牙文化的自我拯救與現代轉型開闢道路。正是在這一系列思想轉向中,奧爾特加逐步擺脫新康德主義的束縛,推動了人類生活思想的基本確立。

(一) 從建構主義到意向性的轉向

奧爾特加早期對馬堡學派的建構主義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試圖通過建構主義的立場來認識和理解世界。新康德主義的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將主體視為客體的創造者,事物的客觀性不是被給予的,而是通過主體的認知活動被建構出來。這種觀念使得認識與實在之間的直接性變成了依賴於實在被認識本身所建構。由此,認識不再是對實在的直接把握,而是依賴於主體的建構行為;真理、實在與客觀性被還原為認識活動自身的內在規定性。

奧爾特加在其早期研究中雖認同這一立場,但自 1911 年接觸胡塞爾現象學之後便對其合理性產生了質疑。他批判性地指出,建構無法解釋認識的原初性質,因為任何建構行為都必須以某種先於建構、直接呈現於主體的實在為前提。換言之,在認識活動中,『存在著一個比建構更為根本的層次,在其中,對象被給予我們,而建構性的綜合基於其上得以實現』。^①在這一層次上,對象以自身方式顯現出來,而主體只能予以注意和把握,而非憑空創造。由此,奧爾特加堅決反對新康德主義將認識視為純粹建構,強調認識必須以某種先於建構、直接呈現於主體的實在為起點。胡塞爾現象學的出現恰好為奧爾特加提供了新的哲學資源。在他看來,直觀是世界上最不神秘的東西,它能夠擺脫一切外在的解釋或預設,讓事物自行呈現。因此,奧爾特加引入了現象學的核心概念意向性,強調主體意識與客體世界之間始終存在一種不可分割的意向關係,認識不再是主體自我封閉性建構,而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相關作用和意向關係的產物。在此意義上,他認為現象學『直觀原則將開啟哲學的一個新時代』^②,並由此開啟了他的現象學研究之路。意向性的引入不僅幫助奧爾特加超越了建構主義的局限,也推動了他對人類生活思想的基本確立。意向性超越了傳統認識論中主客二分的困境,揭示了主體與客體不可分割的統一性,這一思想使他能夠關注諸多對立概念的內在調和,如『印象與概念』、『表面與深度』、『地中海文化與日耳曼文化』以及『人與環境』。在奧爾特加看來,個體與其所處環境並非外在割裂的兩極,而是構成人類生活的統一整體。

(二) 從邏輯理性到具體生活的轉向

新康德主義的馬堡學派以繼承康德為宗旨,但同時強調不能墨守成規,而應在批判中推進其思想。柯亨將康德的先驗方法作為自身哲學體系的核心,主張哲學的根本任務在於揭示作為一切科學知識所依賴的先驗邏輯結構,並將這一結構視為所有科學知識的基石。柯亨主張認識是通過純粹思維實現,『純粹思維運用邏輯範疇既創造認識的形式又創造認識的內容』。^③在這一認識論框架下,他對康德的『物自體』概念進行改造,拋棄了這一概念中的唯物主義成分,將其重新解釋為一種觀念性的、只能通過思維把握的整體經驗,從而構造出一個更為徹底的批判唯心主義體系。基於這一立場,柯亨堅持哲學的基本概念與原則的普遍性,認為哲學在於探尋人類經驗與知識的普遍規律與原則,而不根植於具體的文化、歷史或個人經驗。

然而,新康德主義的純粹和邏輯理性將理性主義推向極端,這種極端化的理性主義不僅導致了哲學和科學的分離,而且使哲學逐漸遠離個體的具體生活處境。奧爾特加在早期雖繼承了柯亨所強調的理性精神,但他也逐漸意識到這種理性主義的局限性,它在揭示世界的邏輯結構時過於依賴先驗主義和理性主義,而忽視了經驗世界的複雜性以及個體在現實生活中的存在性。在他看來,自笛卡爾以來的唯心主義雖然確

立了主體性地位,但也確實存在弊端。但對此的批判不應演變為對個人主體的抹殺。與此相反,『奧爾特加將個體和生命置於普遍和理性之上,這一立場也成為他與柯亨之間的主要分歧』。^②他批判新康德主義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過度強調理性與先驗主體,從而忽視了具體生命與生活境遇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他對生活的看法也逐漸發生改變,生活不應是理念性的,而應是個體在環境中的切身體驗。個體存在並非孤立的自我,而是始終與其所處的環境緊密相連。在這一思想的引領下,奧爾特加實現了從理念式哲思到對現實生活境遇的深刻關注,完成了從邏輯理性到具體生活的哲學轉向,逐步確立了人類生活中我與環境的兩個核心要素,為其人類生活思想的建構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 從理性文化到多元文化融合的轉向

奧爾特加汲取了新康德主義的文化精髓,深信科學、道德與藝術是推動文化發展的三根支柱。在馬堡的學術殿堂裏,文化象徵著無序生活中的秩序,混亂中的法則,主觀臆斷中的客觀性以及非系統化中的方法論。奧爾特加深受這一觀念的啟發,並視之為解決當時西班牙社會文化危機的金鑰匙。但是這種文化卻是『某種理念性的、抽象的且漂浮於個體現實存在之上』^③的概念,缺乏對具體生活境遇的關注。奧爾特加認為西班牙需要的是自我拯救,即回歸具體、個人和主觀。因此,他試圖在科學與文化的理性結構中引入具體、生命與主觀,使哲學重新回到現實生活的根基之上。

奧爾特加深受柯亨美學觀念的影響,他在 1910 年《天堂裏的亞當》一書中闡述的美學便體現了柯亨的美學思想,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奧爾特加對柯亨的美學體系有所打破,並與之產生了分裂。柯亨堅持藝術獨立於自然科學和道德科學。其認為美學旨在超越自然與追隨理性,這才是藝術的目標和問題所在。然而,在探討西班牙畫家祖洛阿加(Ignacio Zuloaga)的藝術作品時,奧爾特加與柯亨的分歧逐漸顯現。按照柯亨的標準,祖洛阿加的藝術缺乏普遍性與理念性,只能被視作一種社會學式的文化表述。但在奧爾特加看來,他的作品更多地是講述西班牙的特定文化和情境,而非普遍的思想。通過對祖洛阿加藝術作品的看法,奧爾特加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新康德主義哲學的局限性。它過分關注事物的概念和系統,卻忽視了缺事物本身,並指出:『現象不是為了理論而做出來的,而是理論為想像而生』。^④這一觀點顯示出了他對新康德主義的批判態度,因為他不像柯亨那樣從日耳曼人的角度來談論藝術,而是從西班牙人的審美視角出發來談論藝術,西班牙的藝術不一定是日耳曼的藝術。

在此基礎上,奧爾特加區分了不同類型的人,每種類型的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西班牙人是地中海文化最鮮明的代表,這種文化的特點是熱愛純粹的事物,熱衷於它們的獨特性和原始狀態,因此,它以一種極端的唯物主義為特徵。與此相反,日耳曼文化則渴望掙脫現實的束縛,追求超越物質世界的靈魂,它追求的是抽象和超驗的境界。奧爾特加指出,『日耳曼文化是關於深度真實的「確定的文化」,而地中海文化則是關注表象的「感官主義」的文化,它們是構成歐洲文化整體的兩個不同的層面』。^⑤奧爾特加批判新康德主義恰恰繼承了這種日耳曼文化的特徵,它以普遍理性為出發點,將哲學簡化為邏輯與概念的演繹,從而遮蔽了現實生活的豐富性與個體生命的獨特性。

奧爾特加明確區分了南方人的地中海文化與北方人的日耳曼文化在對待現實態度上的顯著差異,他們對應於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感性者和沉思者。前者生活在表層維度中,而對於後者來說,世界是一個深層維度。他認為西班牙人是地中海文化的一個典型代表,概念從來不屬於他們,它是充滿活力的印象主義,奧爾特加並不主張放棄西班牙這一傳統文化,他主張將地中海文化的感覺主義與日耳曼文化的理性主義融合起來。他力圖拉進與以日耳曼文化為代表的現代性歐洲的關係,試圖從哲學的視角架起溝通西班牙傳統與現代性歐洲之間互動關係的橋樑。奧爾特加受新康德主義哲學影響顯著,但他並未全盤接受,而是持批判性的接納與融合的態度,這一融合為 1923 年人類生活的核心概念『生命理性』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四、結論

在西班牙深陷社會與文化危機的背景下,奧爾特加選擇赴德留學,希望借助德國先進的科學與文化振興西班牙。在這一過程中,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的理想對他早期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該學派的代表人物柯亨強調哲學的系統性與邏輯性,其關係理念提供了形式化的認識論框架;納托普則在社會教育學中強調人的社會性與相互依賴性,這些思想都深刻地塑造了奧爾特加早期對人類生活的思考。然而,自1911年起,奧爾特加開始接觸胡塞爾現象學,並逐漸意識到馬堡學派的局限性,其過於強調邏輯理性和知識建構,忽視了生活世界的具體性與經驗的原初性。奧爾特加在吸收與同化馬堡學派思想的基礎上,逐步對其進行批判與超越:他從抽象的邏輯理性轉向對具體生活的關注;他從知識建構的立場轉向對意識意向性的探究;他在文化層面突破單一的日耳曼理性主義,嘗試將其與地中海文化的感性主義進行融合,以尋求對西班牙文化的重塑與現代轉型之路。正是通過這一系列的思想轉折,奧爾特加既保持了與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的內在聯繫,又不局限於其框架,而是在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實現了創造性超越,從而確立了以人類生活為核心的哲學基本走向。

參考文獻

- ① Ortega, J. “La idea de principio en Leibniz y la evolución de la teoría deductiva.” In *Obras completas, Tomo VIII*. Madrid: Revista de Occidente, 1965.
- ② Orringer, N. R. *Ortega y sus fuentes germánicas*. Madrid: Gredos, 1979.
- ③ Orringer, N. R. “Adán en el Paraíso: On Cohen in Ortega’s Early Esthetics.” *Hispanic Review*, vol. 47, no. 4, 1979, pp. 469–485.
- ④ H·斯皮哥爾伯格、段小光、路軍平:《世界各國的現象學研究概述》,《哲學譯叢》,1984年第3期,頁62–69。
- ⑤ 帕特裏克·H·杜斯特:《何塞·奧爾特加-加塞特》,邁克爾·格洛登、馬丁·克雷斯沃思、伊莫瑞·濟曼主編,王逢振等譯,《霍普金斯文學理論和批評指南》,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
- ⑥ Cerezo, P. *La voluntad de aventura: aproximamiento crítico al pensamiento de Ortega y Gasset*. Barcelona: Ariel, 1984.
- ⑦ Leszczyna, Dorota. *Ortega y la Escuela de Marburgo*. Schweiz: Peter Lang GmbH, International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20.
- ⑧ Asimov, I. *Los Estados Unidos de 1816 hasta la guerra civil*. Madrid: Alianza Editorial, 1983.
- ⑨ Vilanova, M., Ribas, M. V., and Julià, X. M. *Atlas de la evolución del analfabetismo en España de 1887 a 1981*. Madrid: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1992.
- ⑩ Ortega, J. “La pedagogía social como programa política.” In *Obras completas, Tomo II*. Madrid: Taurus/Fundación José Ortega y Gasset, 2004.
- ⑪ Cohen, Hermann. *Logik der reinen Erkenntnis*. Berlin: Bruno Cassirer, 1922.
- ⑫ Mora, José Ferrater. *Ortega y Gasset: An Outline of His Philosophy*.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 ⑬ Ortega, J. “Meditaciones del Escorial.” In *Obras completas, Tomo II*. Madrid: Revista de Occidente, 1963.
- ⑭ J. O. 奧爾特加、高源厚:《寫給德國人的序》,《世界哲學》,2012年第1期,頁90–102。
- ⑮ Ortega, J. “Algunas Notas.” In *Obras completas, Tomo I*. Madrid: Taurus/Fundación José Ortega y Gasset, 2004.
- ⑯ 奧爾特加·伊·加塞特(著),莫姬妮(譯):《藝術的去人性化》,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頁73–78。
- ⑰ Cohen, H. *Kants Begründung der Ästhetik*. Berlin: Fred. Dümmel Verlagsbuchhandlung, 1889.
- ⑱ Natorp, P. *Pedagogía social: teoría de la educación de la voluntad sobre la base de la comunidad*. Trad. Ángel Sánchez Rivero. Madrid: Ediciones de la Lectura, 1913.

- ①⑨ 何塞·奧爾特加·伊·加塞特(著),王軍、蔡瀟潔(譯):《堂吉訶德沉思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
- ②⑩ Ortega, J. "Kant." In *Obras completas, Tomo IV*. Madrid: Alianza Editoria, 1983.
- ②⑪ 高源厚:《走向『生活理性』——教德嘉對胡塞爾現象學的吸收與批判》,博士學位論文,北京:北京大學,2011年。
- ②⑫ Ortega, J. "Sensación, construcción e intuición." In *Obras Completas, Tomo I*. Madrid: Taurus/Fundación José Ortega y Gasset, 2004.
- ②⑬ 蔣永福、吳可、嶽長齡:《東西方哲學大辭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②⑭ Ortega, J. *Phenomenology and Art*. Translated by Philip W. Silv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 ②⑮ Ortega, J. "Sistema de la psicología." In *Obras completas, Tomo VII*. Madrid: Taurus/Fundación José Ortega y Gasset, 2004.
- ②⑯ 蔡瀟潔:《文學與哲學的交會——奧爾特加-加塞特〈堂吉訶德〉沉思錄的文體問題》,《外國文學》,2020年第2期,頁150-159。

(Editors: JIANG Qing & Derrick MI)